

大江東 浪濤 盡千古 風流 人物 壘西邊 八譜 三國周 郎赤壁 亂石穿 空驚濤 捲起千 堆雪 江山 如畫一時 多少 當年 遙想公

苏 轼 评 传

曾 枣 庄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K825.6/73

苏轼评传

曾枣庄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41249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成都



841249

责任编辑：金成礼

封面设计：刘荣全

苏 轼 评 传

曾枣庄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34千

1981年9月第一版

1981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8,300册

书号：10118·449

定价：0.95元

目 录

17399/27

第一章 苏轼的家世和他的少年时代	1
第二章 仁宗、英宗朝的苏轼——反对守旧，力主革新	25
第一节 名震京师	25
第二节 赴母丧返川	29
第三节 《进策》——苏轼的革新主张	38
第四节 签判凤翔	57
第五节 最后一次返川	70
第三章 神宗朝的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	74
第一节 上书神宗	74
第二节 通判杭州	86
第三节 改知密州	99
第四节 徐州防洪	113
第五节 乌台诗案	121
第六节 贬官黄州	131
第七节 乞居常州	154
第四章 元祐更化时期的苏轼——在新旧两党的夹击中	164
第一节 入奉禁严	164
第二节 再莅杭州	177
第三节 二年闯三州	184
第五章 绍述新政时期的苏轼——从出知重难边郡到远谪海南	198
第一节 出知定州	198
第二节 贬官惠州	203

第三节 再贬儋州	218
第六章 北归和病逝	227
第七章 苏轼的世界观	236
第八章 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254
第一节 苏轼对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的贡献	254
第二节 苏轼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风格	265
第三节 苏轼对词的革新	280
第四节 工书、善画及其他	293
第九章 关于苏轼的评价问题	301

附 录:

一、苏轼年谱	309
二、苏轼著述简介	319
三、苏轼行踪示意图	

第一章 苏轼的家世和他的少年时代

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阴历十二月十九日卯时，在四川眉山县城内纱縠行一个“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里，一代文豪苏轼呱呱坠地了。

眉山位于成都西南二百来里处，岷江由北而南纵贯全境。在眉山西南一百余里处就是以秀丽著称于世的天下名山峨眉山。眉山境内也有一些浅丘。这里确实是“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介岷、峨之间，为江山秀气所聚。”（《眉山县志》）陆游在《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诗中写道：“蜿蜒回顾山有情，平铺十里江无声。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陆游集》第265页）在这“孕奇蓄秀”之地，孕育出苏轼这样的文豪，并不是偶然的。苏轼后来宦游祖国南北各地，仍然对其故乡山水十分眷恋，一往情深，经常回忆故乡山水的美丽：“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东坡集》卷一《东湖》）“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东坡集》卷四《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

眉山不仅山水秀丽，而且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苏轼在寒冷贫瘠的北方作官时，尤其感到故乡温暖、富饶、可爱：

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坡稷如铁甲。

岂如吾蜀富冬蔬，霜叶露芽寒更茁。

（《东坡集》卷九《春菜》）

即使在鱼米之乡的江浙一带作官，他也免不了常常勾起思乡之情：

江南春尽水如天，肠断西湖春水船。
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筍不论钱。

（《东坡集》卷十八《寄蔡子华》）

特别是《送运判朱朝奉入蜀》（《东坡后集》卷二）一诗，苏轼以拟人化的手法，把自己盼归故乡写成故乡盼己归去，对故乡的深厚感情跃然纸上：

蔼蔼青城云，娟娟峨眉月。
随我西北来，照我光不灭。
我在尘土中，白云呼我归。
我游江湖上，明月湿我衣。
岷峨天一方，云月在我侧。
谓是山中人，相望了不隔。
梦寻西南路，默数长短亭。
似闻嘉陵江，跳波吹枕屏。

歌颂祖国的山河美是苏轼诗词一个重要主题，这与他从小受着故乡山水的陶冶，养成了爱好大自然的情性，显然是分不开的。

陆游把眉山称作“千载诗书城”。四川，特别是成都及其附近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汉代的司马相如^①、

^①司马相如（前179—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人，西汉著名文学家，长于辞赋，著有《子虚赋》、《上林赋》等。

扬雄^①、王褒^②等都是四川人。苏轼说：“文章之风，惟汉为盛，而贵显暴著者，蜀人为多。盖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继其后，峨冠曳佩，大车驷马，徜徉乎乡闾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声，与邹、鲁（孔子、孟子的故乡）比。”（《东坡续集》卷十一《谢范舍人书》）唐代的陈子昂^③也是四川人。李白、杜甫虽不是四川人，但李白的青少年时期，杜甫的晚年都是在四川度过的，其他许多唐代诗人如初唐四杰^④也都到过四川，有“天下诗人皆入蜀”之称。晚唐、五代中原大乱，许多文人学士，如韦庄^⑤等人，都避乱于相对来说比较安定的西蜀，进一步促进了西蜀文化的繁荣，使西蜀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五代时花间词派^⑥一大群作家，其中多数都是西蜀人。宋初，赵匡胤平定后蜀孟昶^⑦，接着又爆发了全师雄为首的叛乱^⑧，给四川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西蜀文化曾暂时低落。苏轼说：“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伤不暇，故数十年间，学校衰息。”但是，

①扬雄（前53—公元8年）字子云，成都人，西汉末年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著有《太玄》、《法言》、《羽猎赋》、《长杨赋》等。

②王褒字子渊，蜀郡资中（今四川资阳县北）人，汉宣帝召见他，奉命作《圣主得贤臣颂》。官谏议大夫。作品以《洞箫赋》为最有名。

③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人。武后时官右拾遗，直言敢谏，所陈多切中时弊。后解职归里，为县令段简所杀。他是唐代革新诗歌的先驱，对后世影响较大。

④初唐四杰指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⑤韦庄（836—910）字端己，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人。王建称帝后仕蜀，官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工诗能词，与温庭筠齐名，为花间词派的代表作家。

⑥花间词派是五代西蜀出现的一派词人，如韦庄、薛绍蕴、牛峤、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鹿虔良、阎选、李珣、和凝、孙光宪等。后蜀赵承祚把他们的作品编为《花间集》，因以得名。

⑦孟昶（919—965），五代后蜀国君，934—965年在位。宋灭后蜀，投降，封秦国公。

⑧宋平蜀，纵兵大掠，引起蜀兵叛乱，推文州刺史全师雄为帅，自称兴汉大王，两川大震，后失败。

经过宋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随着经济的恢复，文化又逐渐繁荣起来。很多士人，“相继登于朝，以文章功业闻于天下。于是释耒耜而笔砚者（放下农具来读书的）十室而九，比之西刘（西汉）又以（已）远过。”（《东坡续集》卷十一《谢范舍人书》）在苏轼兄弟参加进士考试那一年，仅眉山一县举荐参加礼部进士考试的竟达四五十人之多，进士及第的就有十三人。苏轼从小受着这种发达文化的薰陶，这对他后来在各个文学艺术领域都取得巨大的成就，无疑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不仅如此，宋初文坛承袭了晚唐五代词藻华丽而内容空虚的文风，而西蜀受“五代文弊”的影响要小些，西蜀文人仍“以西汉文词为宗师。”苏轼说：“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夏、商、周）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关于“士大夫贵经术”的情况，苏轼还进一步说：“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①以前学者，犹袭五代文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至于郡县胥吏，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有足观者。”（《东坡集》卷三十二《眉山远景楼记》）在整个文坛“犹袭五代文弊”时，眉州的士大夫却“贵经术”，“以西汉文词为宗师”，与欧阳修^②等人所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合拍。苏轼父子三人后来深受欧阳修赏识，成为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的主将，唐宋散文八大家，苏轼父子就占了三家，这与他们受西蜀文风的薰陶有直接关系。

苏轼的家庭是一个文学世家，对他产生了更加重大的影响。

^①天圣，宋仁宗年号（1023—1032）。

^②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官至参知政事，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著有《欧阳文忠公集》、《新五代史》、《新唐书》等。

关于苏轼的家世，据其父苏洵所作的《族谱引》和《族谱后录》说：“苏氏出于高阳，而蔓延于天下。”所谓高阳，是指传说中的古帝颛顼，他因辅佐少昊有功，国于高阳，故称高阳氏。

到了汉顺帝时有苏章，曾为冀州（今河北冀县）刺史，又迁为并州（今山西太原）刺史，其子孙家于赵州（今河北赵县），因此，三苏都自称“赵郡苏氏。”

唐朝武则天时有苏味道，赵州栾城（今河北县名）人，九岁能文，与同乡李峤都以文翰著称，时号“苏李”。他在朝曾为凤阁侍郎，后贬为眉州（今四川眉山）刺史；迁益州（今四川成都）长史，未赴任就死了。有一子未能回栾城，在眉州定居下来，从此，眉州才有苏姓。苏味道是一位并不怎么值得称道的人物。他虽曾身居相位，但只是尸位素餐，并没有建立什么功业。他曾对人说，处理事情不要旗帜太鲜明，否则，搞错了会后悔莫及，应“模棱执两端”，即模棱两可，骑双头马儿。因此，当时的人给他取了个意含讥讽的绰号，叫“苏模棱。”证圣元年（695），他与张锡因事下狱，张锡气象自如，苏味道却“席地饮蔬，”装出一副可怜相，以换取武则天对他的从轻处理。（《唐书·苏味道传》）

苏洵开列的苏氏家系很难说有多大的可靠性。苏洵自己就说，他的族谱仅仅“上至于吾之高祖，下至于吾之昆弟”，因为“高祖以上不可详矣。”比较可靠的是苏洵的高祖叫苏祐，高祖母李氏；祖父苏杲，祖母宋氏；父苏序，母史氏。这三代“皆不显”，没有作过什么官，以后在苏辙任执政大臣后，才赠太保、太傅，追封为国夫人。苏序虽未作官，却颇有文化修养，喜作诗，“读书务知大义，为诗务达其志而已，诗多至千余首。”（曾巩《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

苏序有三子：长子苏澹，次子苏涣，苏洵居三。苏澹、苏涣

“皆以文学举进士”（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苏涣并于宋仁宗天圣年间进士及第，在眉州产生了很大影响。曾巩在《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序）墓志铭》中说：“蜀自五代之乱，学者衰少，又安其乡里，皆不愿出仕。君（苏序）独教其子涣受学，所以成就之者甚备。至涣以进士起家，蜀人荣之，意始大变，皆喜受学。及其后，眉之学者至千余人，盖自苏氏始。”苏轼说：“天圣中，伯父（指苏涣）解褐（指高中作官）西归，乡人嗟叹，观者塞途。”（《东坡续集》卷十一《谢范舍人书》）苏辙说，苏涣“登科，乡人皆喜，迎者百里不绝。”（《栾城集》卷二十四《伯父墓表》）可见，苏涣进士及第对乡人震动很大。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他的一生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二十七岁以前，是他“少不喜学”的时期；从二十七岁到四十八岁，是他发奋读书的时期；从四十八岁他带领苏轼兄弟进京应试起，到五十八岁去世，是他以文章名震天下的时期。

苏洵在《送石昌言^①使北引》中说：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指其父苏序）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甚近，又以亲戚故，甚狎（亲近）。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稍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

苏洵在《祭亡妻文》中还说：

^①石昌言名扬休，眉州人。其兄弟石扬言，娶苏序幼女，故文中说“以亲戚故”。

昔予少年，游荡不学。予虽不言，耿耿不乐。我知子心，
忧我泯没。

曾巩^①的《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洵）墓志铭》也说：

君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职方君（指其父苏序）纵而不问，乡闾亲戚皆怪之。或问其故，职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

从以上记述可看出：苏洵青少年时代“游荡不学”，对“学句读，属对声律”，不感兴趣；亲族对此很关心，他的妻子程氏更是“耿耿不乐”；但是，他的父亲苏序对他却很放心，对他“纵而不问。”亲族怪而问之，他或笑而不答，或说：“是，非忧其不学者也。”（曾巩《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甚至说：“非尔所知也！”（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

为什么苏序对其子苏洵这样有信心呢？这不仅因为苏洵“为人聪明，辨智过人”（曾巩《苏明允哀词》），而且还因为苏洵颇有识见，他看不起“属对声律”的时文，对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就有不满。他青年时代几次应试皆不中，他就决心不再走通过科举考试以求仕进的道路。他说：“及长，知取士之难，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上韩丞相书》）他从自身的应试失败，深刻地认识到科举制度窒息人才，他说：“夫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也。”（《广士》）

^①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江西县名）人，官至中书舍人，北宋散文家，著有《元丰类稿》。

以后朝廷根据欧阳修的推荐，召他进京就试策论，他辞不赴试，原因也在于此。他在《上皇帝书》中说：

臣本凡才，无路自进。当少年时，亦尝欲侥幸于陛下之科举。有司以为不肖，辄以摈落，退而处者十有余年矣。今虽然勉强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疎拙，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诏。

他在给私人的信件中，把不赴试的理由讲得更鲜明了：

仆岂欲试者？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自思少年尝举茂才，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今齿目益老，尚安能使达官贵人复弄其文墨，以穷其所不知耶？（《与梅圣俞书》）

所谓“有司之尺度”，即“章句、名数、声律之学”，是束缚人的思想的。那种中夜而起，待晓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考官舞文弄墨，以穷士子所不知的考试制度是摧残人才的，令人“寒心”的制度，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的考试制度。早在北宋中叶，苏洵就如此尖锐地批判了科举制度，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

苏洵既不满“章句、名数、声律之学”，于是转而学习古文，研究我国历代文化的优良传统。他“尽焚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①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

^①指韩愈。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人，官至吏部侍郎，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著有《昌黎先生集》。

“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经过多年苦读，“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

（《与欧阳内翰第一书》）苏洵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具有比较丰富的阅历：“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忆山送人》）这时又辅之以刻苦读书，因此收到了奇效，文如泉涌，“浑浑乎觉其来之易”。他一生的主要著述，如《几策》、《权书》、《衡论》、《六经论》、《史论》等，都是在二十年苦读阶段的后期完成的。他的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欧阳修《荐布衣苏洵状》）他在《几策》、《衡论》等文章中，比较透辟地分析了当时内政上“习于惠而怯于威”，外交上“虏日益骄而贿日益增”的极弱形势，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关于如何刷新朝政的主张。政治上他提出了御将、任相之术，取士、养才之道，主张改革吏治。他说：“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夷狄。”“贤之所在，贵而贵取，贱而贱取”。“布衣寒士而贤则用之。”（《广士》）即要求不拘一格用人才。军事上他主张兵农合一，“家出一兵，”“择其技之精者以为长，在野督其耕，在阵督其战，则其人皆良农也，皆良兵也。”（《兵制》）经济上他要求适当限制土地兼并，解决“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的社会问题。（《田制》）在同辽和西夏的关系上，他反对“羌胡强盛，陵压中国，而邀金缿、增币帛之耻不为怒”的苟且偷安政策。（《审势》）我们很快将看到，苏洵这一整套政治主张，对苏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洵不善诗，他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特别长于策论。他的文章深受《孟子》、《荀子》、《战国策》的影响，文笔纵横恣肆，波澜壮阔，语言简洁苍劲，确有汉唐文风。曾巩说，苏洵的文章“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不

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苏洵这种汪洋恣肆的文风，对苏轼散文也有明显影响。

苏洵有三子三女。长子景先和大的两个女儿均早卒。么女八娘（苏轼之姐）从小才智出众，能诗能文，但遭遇却很不幸。她十八岁嫁与舅舅程溶之子程正辅为妻，过门之后备受虐待，不到两年就郁郁而死了。“有子六人，今谁在堂？惟轼与辙，仅存不亡。”（《祭亡妻文》）“六个子女，只剩下苏轼、苏辙两个。”

苏辙（1039—1112）字子由，号颖滨遗老。嘉祐初与苏轼同科进士及第，官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苏轼兄弟的政治立场是基本一致的。仁宗年高，倦于政事，苏辙直言极谏，敢于指斥时政。神宗朝，王安石变法，推行青苗法，苏辙“力陈不可”。哲宗元祐初，司马光废除王安石推行的免役法，恢复差役法，苏辙也“言其不可。”绍圣初，以“引汉武方先朝”的罪名贬官。徽宗时复官太中大夫，提举上清太平宫。崇宁年间，蔡京当国，又降朝请大夫，罢祠，居许州，再复太中大夫致仕，“杜门宴寂，谢绝宾客，”“不复有意于世。”（《苏适墓志铭》，见1973年第七期《文物》）政和二年（1112）十月三日卒，年七十四。苏辙为文汪洋淡泊，有秀杰之气，著有《栾城集》。

苏洵鉴于自己少年不学，老大“无成”的教训，对苏轼兄弟进行了精心的培养。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他的婴儿时期，由哺乳过八娘的乳母任采莲哺乳。任氏事奉苏轼的母亲三十五年，以后又随苏轼南北奔波，苏轼的三个儿子也是他带大的。苏轼贬官黄州期间，她才去世，终年七十二岁，葬于黄州临皋亭，苏轼作有《乳母任氏墓志铭》来悼念这位慈惠忠厚的老人。

苏轼八岁开始在乡塾读书，学校在眉山天庆观北极院中，有百十个学生，老师是眉山道士张易简。苏轼在这里读了三年书，他从小勤学好问，关心世事。在乡塾里，一天有一位从京城来的人拿出石介^①所作的《庆历圣德诗》给老师看。这是一首歌颂范仲淹^②、欧阳修等人革新朝政的诗。年幼的苏轼从旁观看，好奇地问先生这是些什么人。先生说小孩子何必问这些。苏轼回答说，这是天上的人吗？那我就用不用知道；如果也是地上的人，为什么不可问？先生见他出言不凡，才告诉他范仲淹等都是人中豪杰。年幼的苏轼对这些复杂的政治问题虽不全懂，但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说：“时虽未尽了（了解），则已私识之矣。”（《东坡集》卷二十四《范文正公文集序》）

后来苏洵又送苏轼兄弟到眉山城西寿昌院州学教授刘微之那里读书。刘微之是当地很有学问的人，曾作《鹭鸶诗》，其中有“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之句，他很得意。苏轼认为“逐风斜”没有写出鹭鸶归宿，不如“雪片落蒹葭”好。刘微之认为苏轼改得好，赞叹道：“吾，非若师也！”刘微之去世时，范镇^③的悼亡诗有“案头曾立两贤良”之句，“两贤良”即指苏轼兄弟。

在家中苏轼兄弟“皆师先君”，以父亲苏洵为师。在苏轼十来岁时，苏洵曾叫他作《夏侯太初论》。苏轼竟写出了“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这样的警句。“老苏爱此论”，苏洵很欣赏他这篇习作。苏轼自

①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笃学有志，性行刚正，曾著书以戒奸佞，指切当时，无所忌讳。历任国子监直讲，太子中允，直集贤院等职，著有《徂徕集》。

②范仲淹（8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吴县）人。庆历三年任参知政事，革新朝政，不久罢相，新政失败。有《范文正公集》。

③范镇字景仁，成都华阳人，官至翰林学士，因反对新法，以户部侍郎致仕。哲宗立，欲以为门下侍郎，固辞，封蜀国公。

己对这句也很得意，他在知密州（今山东诸城）时所作的《颜乐亭诗并序》（《东坡集》卷十九）中曾再次用过这一警句。大约也在苏轼十岁左右，苏洵觉得欧阳修的《谢宣诏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写得很好，就叫苏轼拟作。苏洵看了苏轼的拟作很满意，高兴地说：“此子他日当自用之。”苏洵说准了，后来苏轼曾多次入学士院，并多次得到皇帝赏赐的对衣、金带及马。苏洵那时经常游学四方，回家后常把途中见闻告诉苏轼兄弟。在苏轼十二岁时，苏洵从虔州（今江西赣州）回来，对苏轼说，在虔州天竺寺有白居易亲笔书写的一首诗，笔势奇异，墨迹如新。诗的内容是：

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元从一寺分。
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
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
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

这首联珠叠璧式的奇诗，给苏轼留下了强烈印象。四十七年后，他贬官惠州（今广东惠阳），途经虔州，特地前往寻访，可惜诗已不在，仅存刻石而已。（《东坡后集》卷四《天竺寺并序》）苏洵还经常以他在游学中的一些感受教育苏轼。他说，今后的文章写作技巧将越来越高，而思想内容将越来越差。因为他所接触的一些读书人都“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但他非常推崇颜醇之^①的诗文，说他的文章“皆有为而作”，“中当世之过”，“如五谷必可以疗饥”，“如药石必可以伐病”，能解决实际问题。

^①颜太初字醇之，号鬼绛先生，徐州彭城人。少博学、有隗才、慷慨好义，喜为诗，多讥切时事，著有《洙南子》。